

“九一八”后溥仪上演复辟闹剧

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制造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的过程中,各方势力角逐博弈,纷纷将金钱作为筹码,互相收买,演出了一幕幕可憎可笑的闹剧。

国民政府临时抱佛脚

1931年,日本关东军少壮派军官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三省,然后企图建立傀儡政权,以达到统治中国东北的目的。经过权衡,选中了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决定以之作为“元首”。11月2日,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的亲信土肥原贤二来到天津,游说溥仪。

土肥原一到天津,国民政府就掌握了他的行踪,得知其与溥仪会面,顿时紧张起来。其实,早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不久,国民政府就想到了关东军利用溥仪的可能性,但当时溥仪被日本人控制在天津的日租界内,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十分冷淡。一方面,1924年冯玉祥发动政变,废止了辛亥革命中临时参议院制定的《清室优待条件》,将溥仪驱逐出宫;另一方面,1927年军阀孙殿英盗掘了乾隆和慈禧的陵寝,也未妥善处理,溥仪因此衔恨在心。“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急于示好,通过宋子文联系了曾做过溥仪英文教师和顾问的庄士敦,希望他出面沟通,但庄士敦拒绝帮忙。此时得知土肥原面见溥仪,蒋介石立即派人前去面洽,以金钱为诱饵,向溥仪伸出了橄榄枝。

1931年11月4日,国民党监察院委员高友唐来到天津,向溥仪报告了

南京方面的条件:国民政府愿意恢复“优待条件”,支付优待费,并提出了两个支付方案:或者一次性“买断”——付给一笔整数;或者按月支付。如果选择前者,请溥仪开价,以便商酌;如果选择后者,国民政府将每月支付2万元,交换条件是溥仪不与日本人合作并移居上海或国外(不含日本)。为了消除溥仪的顾虑,高友唐甚至主动做出了由外国银行担保的承诺。

但正像俗话讲的“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这样做不仅不会有效果,反而勾起了溥仪的新仇旧恨。他说:“国民政府早干什么去了?优待条件废了多少年,孙殿英渎犯了我的祖陵,连管也没有管,现在是怕我出去丢蒋介石他们的人吧,这才想起来优待,我这个人是不受什么优待的!”虽然溥仪说得很决绝,但高友唐还是做了一番劝说。据溥仪后来回忆,他认为蒋介石“是专门欺软怕硬的,因为他怕日本人,现在看见日本人和我接近,就什么条件都答应下来,等我离开了日本人,大概就该收拾我了”。况且,“他能给我的款子,又怎么比得上整个东北呢?”在这种情况下,高友唐的劝说自然不会有效。

11月10日傍晚,溥仪乔装改扮后,在日本军人护卫下离开天津,潜往东北,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熙洽烧香找错了庙门

溥仪被驻天津日军用汽艇送到大口沽外,然后换乘日本商船。溥仪是孤身前往,随身携带了手枪和一些体积不大的珍玩,还没抵达东北,手枪就送

给了同船的日本浪人,珍玩也让船长拿去“代为保管”。所以,当他在营口港上岸时,用“身无长物”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

几天后,溥仪的随从自天津赶来,除了带来了衣物用品外,并没有带来多少现金。溥仪先住在汤岗子(今辽宁省鞍山市千山汤岗子镇),后移居旅顺,一行人的吃、住行均由关东军负责。虽然生活没有问题,但对习惯于一掷千金的溥仪来说,还是感觉不便。

不过,窘迫的日子没过多久,吉林的熙洽就给溥仪送来了大笔的现金。熙洽是满洲正蓝旗人,其先祖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弟弟,清末官派到日本学陆军,回国后民国建立,服务于东北军,“九一八”事变前,任吉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事变发生后,由于吉林省军政长官张作相在锦州为父亲治丧,群龙无首,熙洽自作主张,投降日军,宣布吉林“独立”,并谋求清朝复辟。

熙洽向溥仪送钱,有着现实的利益诉求。此时关东军密谋建立傀儡政权,“元首”当然非溥仪莫属,但“总理”一职尚无着落,熙洽觊觎的就是这个位置。据溥仪回忆:“熙洽几次派人送钱给我,共有十几万元,求我授他‘总理’之职。”

应该指出,熙洽到溥仪这里花钱买官,纯属烧香找错了庙门。溥仪空有一顶皇帝的高帽,却仅是关东军手中的招牌而已,日本人根本不拿他当回事,至于“总理”人选,从未征求过溥仪的意见。溥仪自幼做皇帝,对臣子的供奉早已习以为常,收到贿款后,顿时感觉腰粗气壮,开出了详细的购物清单,让随从去大连市购买,至于熙洽的“总理梦”,早就抛到九霄云外了。

日本人给溥仪开出“年薪”

1932年1月28日,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来到旅顺,向溥仪通报了日方的意见:建立“满蒙自由国”,或名为“满蒙共和国”,推举溥仪任“大总统”,任期7年,如果条件成熟,可以考虑改“总统”为

“皇帝”。溥仪顿时火冒三丈,坚持要复辟清朝,反对取消皇帝称号。板垣征四郎反唇相讥,双方争执激烈。之后,溥仪宴请板垣征四郎并赠送了古董珍玩,这无疑是想争取回旋的余地,满足自己当皇帝的夙愿。

当初关东军诱骗溥仪潜往东北时,承诺实行帝制,对溥仪复辟清朝的愿望也未加反驳,此时不但不兑现诺言,反而要建立“共和国”,所以溥仪难以接受。其实,关东军此举是为了欺骗世界舆论。因为共和制是体现多数人意志的一种政体,这与关东军宣称的“满洲民众要求独立自主”的谎言合拍。当然,板垣征四郎收礼后也做了疏通,最后关东军为了照顾溥仪的情绪,决定“国号”中不出现“自由”“共和”之类的字眼,使用较为笼统的“满洲国”称谓,另外,元首也不叫“大总统”,改称“执政”。

1932年3月6日,溥仪在关东军安排下离开了被软禁三个多月的旅顺,乘火车前往长春出任伪职。途中,板垣征四郎拿来一个简短的文件,请溥仪照抄一遍。文件的内容是将“满洲国”的治安、“国防”委托给日本并负担相关费用;“满洲国”任用日本人担任官吏,具体人选由关东军指定等。其实,溥仪已是笼中之鸟,但关东军仍不放心,一定要他留下字据,而且特意强调落款时间不能写当日,因为此时溥仪尚未就职,所以要押后注明“大同元年三月十日”。附带指出,所谓“大同”是伪满洲国的“年号”,其以1932年为“大同元年”。

溥仪踌躇了一会儿,让随从人员执笔,写好后自己签字盖章,然后交给板垣。板垣检查核对后,让日军士兵拎来了一个沉重的皮箱,放到溥仪面前,说这是关东军的一点心意,一共20万日元。这是溥仪卖国的第一笔收入。还应指出,关东军支付给溥仪的卖国酬金,并非一次性买断,溥仪到长春担任伪满“执政”,年薪50万元,后来改行帝制,升至80万元,此外,每年另给80万元,用作宫廷的日常运作开支。

据《同舟共进》喻大华/文

丁悚笔下的名人旧事

中国现代漫画的先驱者之一丁悚曾是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上海美专)初创时的第一任教务长,他在《艺术叛徒》一文中写道:“刘海粟作画,曾自署艺术叛徒,人家辄目为狂妄夸大。我认为他这个别署,并不过分。”继而谈起上海美专的“裸体画事件”。现如今美术院校请一位女模特不算什么大事,但在民国初年保守势力强大的背景下,这件事并不容易。丁悚澄清了一段历史:刘海粟请的第一位女模特并不是传说中的青楼女子,而是他姐姐身边一个唤作“来安”的丫头,“来安”穿着随身的服装勇敢出场;至于裸体女模特,是由刘海粟家中一名唤作“阿宝”的“粗做大姐”喝了“头啖汤”。而第一位男性模特,是美专的茶房。为了减轻模特的心理压力,刘海粟采取“男女有别”的做法,让女学生画女模特,让男学生画男模特。

丁悚与梨园界的名家相当熟悉,在其《四十年艺坛回忆录》中对梅兰芳、杨小楼、余叔岩、谭小培、程砚秋、荀慧生等都有记述。在《程砚秋赴宴受窘》一文中,丁悚披露了当年程砚秋南下申城所受的一段委屈。文章开篇说:“……其实一个唱戏的能成为名伶,做到红角儿地位,千人中能有几人呢?况且其中甜酸苦辣备尝,非身历其境者,谁都不知。”接下来讲一次高亭公司老板徐小麟为欢迎程砚秋而招宴于大西洋餐馆,邀请文艺界四五十人作陪,排场着实不小,但程砚秋迟到了足足两个小时,用过一菜一汤后即向主人作揖告辞。一位特邀嘉宾击桌而起,“直指程砚秋说:‘你是什么东西,不过是个唱戏的,瞧得起你,请你,搭那么大的架子,一到就走,太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不准走!’一时主宾尽窘,几无法下台”。

据《北京晚报》沈嘉禄/文